

## 【论 文】

# 徘徊到纠结<sup>1</sup>

## ——顾颉刚关于“中国”与“中华民族”的历史见解

葛兆光<sup>2</sup>

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《顾颉刚日记》，刚到手时曾匆匆翻过一遍，2007年10月在大阪关西大学遇见专程去接受名誉博士称号的余英时先生，他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《未尽的才情：从〈顾颉刚日记〉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》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），看过之后，对顾颉刚的这部日记更有了浓厚兴趣。去年夏初，要在芝加哥大学的workshop上讲“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”，自不免又要涉及这个古史辨领袖，便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出《顾颉刚日记》来读，既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史资料，也作为异域长夜消遣的读物。但日记太多，在美国没看完，八月回到上海后，在酷暑中仍然继续翻阅。

积习难改，虽是消遣却不想一无所获，习惯性地随手做一些摘录，也断断续续记下一些感想。余先生《未尽的才情》已经讲到顾颉刚与傅斯年、胡适的学术关系，讲到顾颉刚与国民党的纠葛，讲到他一九四九年后的心情，也讲到了他对谭慕愚的一生眷念。夫子撰书在前，我没有更多更多的议题可以发挥，只是近来关注“中国”的历史，于是一面阅读，一面随手写一些札记，主要摘录和讨论的，都是顾颉刚日记中有关“中国”和“中华民族”的见解。

### 一、

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，一九二〇年代顾颉刚推动“古史辨”运动，从根本上说，是一场对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现代性改造，这一点，王汎森兄的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》（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）已经论述得很清楚。简单地说，就是在科学、客观、中立的现代标准下，有关早期中国历史的古文献，在“有罪推定”的眼光下被重新审查，人们逐渐把传说（或神话）从历史中驱逐出去。以前在古史记中视为“中国”共同渊源的五帝和“中华民族”历史象征的尧、舜、禹，以及作为中国神圣经典的种种古文献，真实性都遭严厉质疑。

一九二三年，顾颉刚在一封公开信里提出古史辨的纲领，一共包括四点，即“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”、“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”、“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”和“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”，因此而被丛沅珠、戴季陶等人惊呼为“动摇国本”。为什么会动摇“国本”？就是因为“民族出于一元”说明中国民族有共同祖先，“地域向来一统”表示中国疆域自古如此，古史传说人物象征着民族伟大系谱，而说古代为黄金时代，则暗示着文化应当回到传统。象征本身即有一种认同和凝聚的力量，对这些象征的任何质疑都是在质疑历史之根，在瓦解“中国”认同的基础。

这里长话短说。对于“中国”一统和同源的质疑，虽然轰动一时，但很快逆转，毕竟形势比人强。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事变”、一九三二年“满洲国”成立、一九三三年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”成立，加上一九三五年“华北自治运动”的出现，使中国陷入国土割裂的空前危机，中国学界不能不重新调整有关和“中华民族”的论述，特别是从历史、地理和民族上，反驳日本学界对于满蒙回藏的论述，捍卫中国在民族、疆域和历史上的统一性。现实情势改变了中国学界，也暂时改变了顾颉刚的立场。一九三四年，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《禹贡》半月刊，正如顾颉刚所

<sup>1</sup> 本文刊载于《书城》2015年5月号（[https://www.sohu.com/a/126943806\\_501399](https://www.sohu.com/a/126943806_501399)）。

<sup>2</sup>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。

说，在升平时代学者不妨“为学问而学问”，但在“国势陵夷，局天脊地”的时代，却只能“所学务求实用”。

在这一绝大背景下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傅斯年在《独立评论》第一八一号发表了《中华民族是整个的》，他强调中国自从春秋战国，“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”，所以有秦汉统一，“我们中华民族，说一种话，写一种字，据同一的文化，行同一的伦理，俨然是一个家族”。顾颉刚也一样，原本他并不相信“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，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”，他觉得“这实在是误用了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秦汉以前的疆域”，所谓“向来一统”只是一个“荒谬的历史见解”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却把历史论述从说明原本并不是一统的中国，变成了强调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。

在《禹贡》半月刊之后，一九三六年，顾颉刚与史念海合作编了《中国疆域沿革史》，在第一章《绪论》中，顾颉刚就说：“在昔皇古之日，汉族群居中原，异类环伺，先民洒尽心血，耗竭精力，辛勤经营，始得近日之情况（指现代中国）。”他罕见地用了“皇古”一词，说“疆域之区划，皇古之时似已肇其痕迹，自《禹贡》以下，九州、十二州、大九州之说，各盛于一时，皆可代表先民对于疆域制度之理想。很显然，这与一九二〇年代的疑古领袖形象已经相当不同，看上去，他好像逐渐放弃了古代中国人种不出于一源、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立场，而开始转向论证一个“中国”和一个“（中华）民族”。

在这里说一个小插曲。一九三三年，日本人与内蒙古王公会谈，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而独立。这时，顾颉刚一生仰慕的女性谭慕愚亲身进入内蒙，调查这一事件，并且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底，应顾颉刚之约在燕京大学连续演讲，讲述“百灵庙会议经过及内蒙印象”，揭发内蒙独立与日本阴谋之关系。余先生《未尽的才情》一书已经注意到，顾颉刚在日记中一连好几天记载这件事情，我曾向余先生请教，我们都怀疑，一九三三年谭慕愚女士的调查与演讲，在某种程度上对顾颉刚的史学转向产生了很大影响，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，刺激了第二年他与谭其骧合办《禹贡》半月刊。

## 二、

《顾颉刚日记》中留下很多这一观念转变的痕迹。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国府南迁，各大学与学者纷纷南下。一九三八年底，顾颉刚去了一趟西北，据日记说，他在途中开始看伯希和的《支那考》及各种有关边疆的文献，包括国内学者的民族史、疆域研究著作。显然，这种学术兴趣与政局变化有关。顾潮《历劫终教志不灰》（华东师大出版社）引述顾颉刚自传，说他一九三八年在西北考察的时候，曾经偶然看到一幅传教士绘制的 The Map of Great Tibet，心情大受刺激。他认为，满洲“自决”还不足畏，因为那里汉人很多，倒是西藏非常麻烦，“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，称为民族自决，是毫无疑问的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、语言、宗教、文化和大块整齐的疆土，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，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，我国的西部就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”。

学术与政治，在这种危机刺激下，找到了一个结合点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顾颉刚在《益世报》创办“边疆周刊”，并且为它撰写“发刊词”，呼吁人们不要忘记“民族史和边疆史”，来“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”。紧接着，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，顾颉刚特别在《益世报》的新年一期上发表《“中国本部”一名亟应放弃》一文，他说（中国本部）这个词，“是日人伪造、曲解历史来作窃取我国领土的凭证”。二月份，他又连日撰写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，明确提出“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”，并且郑重宣布，今后不再从中华民族之内，另外分出什么民族，也就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、苗等等。



这篇文章二月十三日起在《益世报》发表后，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巨大反响，不仅各地报刊加以转载，张维华、白寿彝、马毅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讨论。前些年与他渐生嫌隙的傅斯年，尽管主张在国家危机之时，写信劝他不要轻易地谈“民族、边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词”，不要在《益世报》上办“边疆周刊”，但也对顾颉刚关于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的观念表示赞同，觉得他“立意甚为正大，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”。在一封致朱家骅、杭立武的信件中，傅斯年痛斥一些民族学家，主要是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，是拿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当令箭，“此地正在同化中，来了此辈学者，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进行打击，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”。

从《顾颉刚日记》中可以看到，顾颉刚对自己这一系列表现相当满意，他一向很在意别人对他的反应。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，顾颉刚在日记中记载说：有人告诉他，《益世报》上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的文章，有《中央日报》转载，“闻之甚喜，德不孤也”。二十二日的日记又记载：有人告诉他，“重庆方面谣传，政府禁止谈国内民族问题，即因予文而发。此真牛头不对马嘴，予是欲团结国内各族者，论文中彰明较著如此，造谣者何其不惮烦乎”。到了四月十五日，他又在日记中说：方神父告诉他，这篇文章“转载者极多，如《中央日报》、《东南日报》、安徽屯溪某报、湖南衡阳报、贵州某报，皆是。日前得李梦瑛书，悉《西京平报》亦转载，想不到此文（指《益世报》所发表）乃如此引人注目。又得万章信，悉广东某报亦载”。

### 三、

来自学界的争论风波与舆论压力，也影响到政党与政府，此后，国民政府不仅成立了有关西南的各种委员会，国共两党也都对西南苗彝发表看法，连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、边疆教育委员会也特别要确认教材的“民族立场”和“历史表述”。这种观念得到政界和学界的一致赞同。傅斯年还说要三民主义、中国史地、边疆史地、中国与邻邦之关系等编为浅说，译成上列各组语言（指藏缅语、掸语、苗傣语、越语、蒲语），顾颉刚和马毅也建议重新书写历史教材，作成“新的历史脉络”，“批判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污染，而导致的学界支离灭裂”。可见抗战中的顾颉刚，似乎暂时放弃了“古史辨”时期对古代中国“黄金时代”传说的强烈质疑和对“自古以来一统帝国”想象的批判，而对“中国大一统”和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比谁都重视，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，他为边疆服务团作团歌，其中就写道：“莫分中原与边疆，整个中华本一邦”，“天下一家，中国一人”。

在这个时候，原本有嫌隙的傅斯年和顾颉刚，在这一问题上倒颇能彼此互通声气。据顾颉刚的日记记载，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，当他开始写“答费孝通”一文时，傅斯年曾“开来意见”，而顾颉刚则据此“想本文结构”，第二天，他写好“答（费）孝通书三千余字”，同时把稿子送给傅斯年，第三天，“孟真派人送昨稿来”。显然两人互相商量，而且傅斯年还提供了一些可以批判民族学家们的材料。又过了十几天，他“抄孟真写给之材料，讫，预备作答孝通书”。从《日记》中我们知道，是在傅斯年的鼓励下，顾颉刚接连好多天奋笔“作答孝通书”，并“将答费孝通书修改一过”。

可见在回应吴文藻、费孝通等有关“民族识别”的问题上，作为历史学家的顾、傅是协同并肩的，他们都不赞成过分区别国内的民族，觉得大敌当前，民族各自认同会导致国家分裂。顾颉刚似乎义无反顾，一向好作领袖的他，这次冲在最前面，把这种维护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思想推到极端，以致后来对傅斯年也颇不假辞色。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抗战刚刚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，顾颉刚在日记中贴了一则剪报，便是八月二十七日重庆传说的各报刊载的《傅斯年先生谈中苏新约的感想》。

傅斯年在这里说道：中国需要二三十年的和平来建设国家。他提到中苏应当做朋友，又说到新统一的国家初期，需要对邻邦妥协。他还特别在谈到有关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问题时，指出中苏



关系中，外蒙古被分割大家最注意，但相关历史却被忽略掉，因为外蒙古的四个汗国，即车臣汗、土谢尔汗、札萨克汗、三音诺颜汗，“照法律是外藩不是内藩”，所以外蒙古与内蒙古、东北不同，与西藏也不一样。顾颉刚看到这篇报道之后勃然大怒，不仅瑜亮情结再一次被拨动，爱国情绪也再一次激发，他在日记中痛斥傅斯年：“此之谓御用学者”！并加以解释说：“这一段话，当是他帮王世杰说的。”下面，顾颉刚又写道：“闻人言，有一次为新疆问题开会，孟真说，‘新疆本是我们侵略来的，现在该得放弃’。不晓得他究竟要把中国缩到怎样大，真觉得矢野仁一还没有如此痛快。割地即割地，独立即独立，偏要替它想出理由，何无耻也！”他也许忘记了，当年傅斯年挺身而出主持《东北史纲》的撰写，就是为了批驳矢野仁一，捍卫东北作为中国领土的。

这也许可以让人理解，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，何以在抗战之中，会去草拟“九鼎”铭文，赞颂那个时代的“一个国家”、“一个领袖”。

#### 四、

不过，顾颉刚毕竟是历史学家，是“古史辨”的领袖。超越传统建立现代史学的观念根深蒂固，没有那么轻易去除。在心底里，顾颉刚对于古代中国的看法，终究他还是“古史辨”时代奠定的。只是在特定时代和特定背景下，有些话不便直接说就是了。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，他在日记里说有人向他回忆“古史辨”当年在上海大出风头。关于这点，顾颉刚一方面很得意，一方面又很清楚：“在重庆空气中，则以疑古为戒，我竟不能在此发表意见。孟真且疑我变节，谓我曰：君在学业上自有千秋，何必屈服。然我何尝屈服，只是一时不说话耳。”这是他的自我安慰，也是他的顺时之策，因为在那个太需要国家认同的时代，再强调瓦解同一历史的古史辨思想，就有些不合时宜。

历史学家，常常受时代和政治影响，这也许谁都无法避免，但一旦现实情势有所改观，原本的历史意识就会卷土重来，特别是在私下里，不免故态复萌，也会说些真心话。顾颉刚日记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有一则记载，很值得注意，他说：“（赵）朴初作文，有‘自女真族统治中国以来’一语，有青年批判，谓女真族即满族前身，而满族为中华民族构成一分子，不当挑拨民族感情。奇哉此语，真欲改造历史！去年闻有创为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的大国’之说，已甚駭论，今竟演变为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大族’，直欲一脚踢翻二十四史，何其勇也？”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资料。顾颉刚虽然在抗战时就提出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，但骨子里却仍然相信民族的历史变迁，并不以为“中国”自古以来就是“一个”。

这种想法常常在他脑海里浮现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，他在日记中记载：“（黄）少荃谈北京史学界近况，知某方作中国历史，竟欲抹杀少数民族建国，谓中国少数民族无建国事，此之谓主观唯心论！”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判断。不过，形势比人强，何况家里还有一个时时令他看风向不要说错话的夫人在。我在日记中看到，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，他对来华跟他学习古代史的朝鲜学者李址麟有些戒备，为了让自己免于犯错，他先走一步，给中华书局写信，说李的《古朝鲜史》很有问题，“朝鲜史学家以古朝鲜曾居东北，受自尊心之驱使，作‘收复失地’的企图，李址麟则系执行此任务之一人。其目的欲将古代东北各族（肃慎、穢貊、扶余、沃沮等）悉置于古朝鲜族之下，因认我东北全部尽为朝鲜旧疆。今更在东北作考古发掘，欲以地下实物证之。而我政府加以优容，甚至考古亦不派人参加，一切任其所为。予迫于爱国心，既知其事，只得揭发。”

差不多半年以后，他与张政烺谈朝鲜史问题，当张政烺告诉他，历史所同仁奉命收集朝鲜史资料的时候，他才松了一口气，很得意自己有先见之明，在日记中说，“此当系予将李址麟《古朝鲜史》送至上级，及予于今年八月中旬写信与中华书局之故。”



## 五、

读《顾颉刚日记》，断断续续用了我一个多月的闲暇时间。看完这十几册日记后，记下的竟然是一些颇为悲观的感受。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？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呢？读《顾颉刚日记》，想起当年傅斯年从国外给他写信，不无嫉妒却是真心赞扬，说顾颉刚在史学上可以“称王”了，但是，就算他真的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的“无冕之王”，这个历史学的无冕之王，能摆脱民族、国家的情势变化，保持学术之客观吗？他能遗世独立，凭借学术与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吗？

——2014年7至8月摘录，2015年1月写于上海

## 【论 文】

### 国家民族的宪法表述与宪法意义<sup>1</sup>

夏引业<sup>2</sup>

**摘要：**中华民族是我国的国家民族。“中华民族”被明确确立为一个宪法概念，则国家民族必然成为一个宪法学概念。国家民族是一个普遍的宪法现象，现代宪法主要有两种国家民族的表述方式，一是直接将国家民族写入宪法文本，二是“我们人民”的表达式。国家民族指明了制宪权主体及其范围，体现了国民的身份归属，具有标识国家、促进国民统合、维护国家统一的宪法意义。就我国宪法而言，国家民族有助于区分宪法中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，作为我国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民族具有优越性，是推动国家完全统一的宝贵的宪法资源。国家民族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，应将国家民族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宪法学范畴。

**关键词：**国家民族；宪法表述；宪法意义

#### 一、引 论

“民族”是中国宪法中的一个重要词汇或概念。现行宪法 69 次使用的“民族”一词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，一是 56 个民族层面；二是国家层面，也即国家民族，二者分别对应不同的英文单词 ethnic 与 nation。前者如民族平等、民族团结、民族区域自治等；后者如民族解放。长期以来，法学关于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一层面，探讨的大多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、民族区域自治、民族团结等方面，而对后者有所忽略。<sup>3</sup> 此种状况或许与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中国是一个“统一的多民族国家”有关。2018 年 3 月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 32 条和第 33 条，两次提到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”的表述。“中华民族”入宪再次凸显了宪法中“民族”概念的两层次性。可以预料，对国家民族的研究将持续成为宪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。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，将民族学、政治学中的“国家民族”概念引入宪法学研究领域。在笔者看来，中华民族是我国的国家民族，“中华民族”入宪，则国家民族必然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

<sup>1</sup> 本文刊载于《甘肃政法学院学报》2019年第4期，第42-51页。

<sup>2</sup> 作者为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，法学博士；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博士后。

<sup>3</sup> 笔者注意到，西北政法大学的常安教授已经在著作中正式使用了“国家民族”一词，但可能是考虑到该词在宪法学领域的陌生性，出于谨慎，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使用。参见常安：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》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，第 247 页。